

论“三农”问题路径演变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发展的影响

范 怡

昌吉学院，中国·新疆 昌吉 831100

【摘要】“三农”问题路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重要国家发展战略。对“三农”问题路径演变进行梳理，历经经济体制改革、紧守粮食安全、全面小康愿景、乡村振兴战略多个阶段，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物价、内需、经济均造成一定影响。根植于此，提出以乡村振兴为核心，提升“三农”服务水平；以产业振兴为要点，提升农业竞争力；以生态治理为抓手，打造农村生态宜居地；以公共服务为核心，提升农民幸福感。

【关键词】“三农”问题；宏观经济；乡村振兴；粮食安全

2021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协同颁布中央一号文件，即《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简称《意见》）。《意见》强调，纾解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困境，重点难点在于“三农”；建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潜力后劲也在“三农”；应对内外各种严峻挑战，基础支撑更在“三农”。对于中国而言，“三农”工作历来是国内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压舱石”，也是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前提。中国共产党百年以来的奋斗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始终围绕“三农”进行战略部署的决策完全正确，为维护中国经济平稳运行有效赋能^[1]。事实上，中国“三农”问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跟随时间演变、形势变革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有鉴于此，聚焦“三农”问题路径演变认识探讨其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发展的影响，期冀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维护中国宏观经济平稳运行提供理论参考。

1 “三农”问题路径的演变趋势

1.1 经济体制

自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就将“三农”问题纾解视为国家重点发展领域，并着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2]。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并正式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是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经济组织承保土地进行生产。该经济体制的核心本质仍然属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但在公有制的基础上促使农户获得生产、分配的自主权。自农村地区普遍施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集体优势以及个人积极性均可充分发挥，可以广泛提高劳动生产率，继而提升农民生活水平。在这一背景下，农村经济体制渐次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发展，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有效赋能。在一定程度上，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显著调动农户生产工作积极性，充分解放农村生产力，极大程度上推动农业发展。

1.2 粮食安全

对于中国这一人口14亿余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粮食安全长期是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保障“三农”安全的核心要点^[3]。甚至国际之中已有诸多国家因粮食危机损害到经济增长，甚至已经威胁到政治安全。在此背景下，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的担忧急剧增加。为确保“三农”安全，中央政府在2001年发表《中国粮食问题》白皮书，强调中国需要依靠自身力量实现粮食自给，消除粮食安全问题。2021年最新颁布的“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更是聚焦粮食安全提出明确指标，要求充分保障粮食安全。在中央政府的不断努力下，中国粮食生产不断提质增效，有效保障粮食安全。截止2021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已经实现连续16年增长，更是持续6年逾1.3万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更是达到470公斤，显著高于国际规定的400公斤粮食安全红线。

1.3 全面小康

“小康社会”是1978年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蓝图规划时提出的战略构想，不仅要求实现“三农”温饱，更要着力推进农民富裕、安居乐业。针对全面小康社会战略部署，中央政府着力推出脱贫攻坚等多项政策决议，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诸多领域取得有效进展。与此同时，各地政府着力推进全面小康进程，努力实现小康愿景^[4]。这一背景下，“三农”问题不仅得到有效纾解，更使“三农”倾向好发展。对于中国而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党英明决策的充分体现，也是我党在“三农”领域工作取得的重大进展。2021年2月，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会议召开，宣告中国脱贫攻坚战役已经取得全面胜利，全面小康取得决定性胜利。

1.4 乡村振兴

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来，党中央立足“三农”发展实际，指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将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核心重点^[5]。立足于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创新提出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为现时及未来一段时期内“三农”工作指明方向。乡村振兴的实施目标是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且充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全面强化农村基础基层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实施乡村振兴既是建立健全现代社会治理格局的固本之策，亦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2021年2月，中央政府、国务院联合颁布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全面深化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明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正确性与重要性。

2 “三农”问题路径演变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发展的影响

2.1 物价影响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内“三农”一直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具有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农业生产无法稳定，就会导致宏观经济无法平稳运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历经两次通货膨胀，根本原因均是粮食供给无法确保，粮食价格渐次上涨。党中央也提出过“无农不稳”的重要观点。可以知悉，“三农”问题将会通过影响物价进而影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

2.2 内需影响

在中国确立“十四五”时期双循环发展格局以后，首先需要拓展内需。而拓展内需的重要阵地即是农村。对于农村及农户而言，仅当生活达到一定程度富裕水平，方可将生存消费转移至享受型消费。以此释放内需，满足内循环格局建设要求。事实上，在新冠疫情以及全球经济逆行情况下，释放内需是决定宏观经济发展是否能够逆势上涨的重要手段。可以知

悉，“三农”问题也会对中国的内需造成影响。

2.3 经济影响

依据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20年农业完成GDP达到8.1104万亿，占据全国经济总量7.98%。由此可知，中国农业仍是整体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是以，着力推动“三农”问题解决，可以有效提升经济总量。另外，政府部门也会针对农村经济总量就宏观经济政策发展作出适应性调整，使其匹配经济发展方向。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政府实施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显著提升农业经济发展水平。

3 政策建议

3.1 以乡村振兴为核心，提升“三农”服务水平

乡村振兴是“三农”问题现阶段的重要指导方针，也是提升“三农”服务水平的必由之路^[6]。有鉴于此，对应农业农村部应当以乡村振兴为核心指导，切实提高“三农”服务水平。一方面，乡村政府应当以乡村振兴为指导，提升农民、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县政府当以乡村振兴为指示，切实提高现代化治理能力。同时，在乡村振兴战略指导下，中央政府应当全面优化农村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新型空间布局，进而提升“三农”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战略地位。此外，地方政府需以乡村振兴为核心指导，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破除城乡二元发展格局。

3.2 以产业振兴为要点，提升农业竞争力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重要战略，也是筑牢中国农业发展根基的核心要点。首先，推进农业生产高质量发展。现阶段，农业不仅需要实现高产高量，更要注重生产质量，促使农业生产走向绿色化、特色化以及品牌化。同时，政府部门当发挥主导作用，建立健全农业生产、产业、经营体系，建构适度规模经营与小农户对接的现代生产体系，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需要发挥主导能效，培育中国农业发展新动能。地方政府应当充分推进数字农业兴建，借助数字技术优势推动农业生产提质增效。此外，中央政府也需深度挖掘农业的功能效用，推动农业及其与第二、第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景观农业、乡村旅游等创新业态。除此之外，对应政府也需着力培养农业高技术人才，培育一批新型职业农民，为乡村振兴提供有效赋能。

3.3 以生态治理为抓手，打造农村生态宜居地

农村是国内多数人口生活集聚的重要场域，也是全国最为基础的生态屏障。过去，农村发展过于重视经济增收，忽略生态环境维护，引致农村环境每况愈下。为此，农业部门、地方政府需着力做好配合，以生态治理为抓手，打造农村生态宜居新场域。其一，着力拓展农村绿色生态空间。区域政府部门当着力做好荒山造林、生态修复引导工作，着力共建生态宜居的乡村场域。同时，政府部门也当推进湿地、草原的保护、修复工作，增强农村生态系统的灾害防护能力。其二，倾力农村生活环保治理。农村地区需加快推进厕所改造工程，争取实现100%农村无害厕所全覆盖。不仅如此，地方政府也需着力推进垃圾桶覆盖工程，消除农村生活垃圾乱扔乱放的困境。其三，推进农村污水治理。地方政府可着力建设农村污水处理点，合理处理农村地区所排放的污水，避免污水造成环

境污染。

3.4 以公共服务为核心，提升农民幸福感

着力提升农户公共服务获得水平是国家政府重点在“十四五”时期的工作要点，要求合理建立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机制，以此提升农民幸福感。第一，地方政府应当统筹完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强化农村道路、能源网络、网络设施等多个方面的建设，支撑农村公共服务提档升级。同时，建构长效机制，对相关基础设施进行维护。第二，全面深化公共服务资源投入力度。地方政府应当充分加大农村公共服务的资源投入，尤其是资金资源。政府部门可通过财政资金投入、社会力量筹集等多元方式向农村地区倾斜资源，确保农村公共服务可有充足资金保障。第三，推进重点领域公共服务系统建设。政府部门需要渐次推进农民基本保障城乡均等化，健全农民基本养老保险、社会保险、医疗保险，提升农民的保障水平。

4 结语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三农”经历经济体制改革、紧守粮食安全、全面小康愿景、乡村振兴战略多次变革，有效纾解“三农”发展困境。事实上，“三农”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每次变革均会对中国经济运行发展造成一定影响。立足中国“三农”问题演变路径及其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提出以乡村振兴为核心，提升“三农”服务水平；以产业振兴为要点，提升农业竞争力；以生态治理为抓手，打造农村生态宜居地；以公共服务为核心，提升农民幸福感。值得注意的是，“三农”问题属于中国长期发展需要严格坚守的底线。正如《“十四五”规划纲要》所言，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打造双循环新格局，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未来，政府部门、社会各界以及学术研究人员，仍当紧抓“三农”进行研究，赋能“三农”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 谢芬. 新时代中国“三农”问题演变及破解思路[J]. 农村经济, 2019 (6): 15-21.
- [2] 冯丹萌, 金书秦. 乡村振兴背景下“三农”工作的“守”与“进”[J]. 行政管理改革, 2021 (10): 82-87.
- [3] 汤志伟, 方錄, 叶昶秀, 等. 中国共产党百年“三农”政策实践: 回顾与启示[J].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21 (4): 21-30.
- [4] 宋洪远, 张益, 江帆.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的“三农”政策实践[J]. 中国农村经济, 2021 (7): 2-23.
- [5] 王胜, 吴大兵. 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百年探索、经验与展望[J]. 农村经济, 2021 (7): 1-10.
- [6] 慕良泽, 赵勇. 中国共产党“三农”战略: 百年回溯与展望[J]. 中国农村观察, 2021 (3): 2-14.

作者简介：

范怡 (1992.4.16-), 女, 汉族, 籍贯: 河南固始人, 学位: 新疆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硕士, 学校及职务: 昌吉学院经济管理系教师, 研究方向: 三农问题、乡村振兴。